

# 文化中的错位、畸变与转码

赵毅衡

DOI:10.14065/j.cnki.nfwt.2016.03.007

## 1. 错位—畸变—转码 三个术语的由来

“错位”这个词,在中文学界太常用了,但是意义极为广泛,“错位”大致意思是“错误位置”或“错开位置”。可以是指任何用错地方,医学上关节错位、脊椎骨错位,地质上断层错位,文化上我们经常见到“传统价值错位”、“学术道德错位”、“性别角色错位”、“屌丝男与白富美的错位婚姻”,大致上指判断错误的做法,不应当处于某地位的人物,等等,看来大部分的错位真的是“错”,虽然本文将讨论比较中性的错位。

积极的错位也有可能出现,虽然不是很普遍。例如在经济学中有所谓“错位竞争”,在地方发展中则有“错位发展”,在商品经营上有所谓“错位营销”,都有些机会主义的策略味道,大致上指的是寻找别人留下的空挡求发展生存。消极的错位,有可能产生现有文化规范无法处理的恶性后果,可以称为意义活动中的“畸变”(mutation)。畸变是一个文化,或一个生存系统不想见到的,只能设法避开或消除的,不使它延续或蔓延,但是如果错位是积极的,产生的后果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成为文化演变中的转折,此事我们称为“转码”(transcoding)。

错位此词西文无对译,只能说西文无此概念。而“转码”一词,情况几乎翻了过来,英文 transcoding 词义丰富,在电子技术上中文此词意义比较明白,在这个电子技术更新太快的时代,专门指电子文档从一种编码转到另一种编码,例如从模拟式录像转为数字式录像。比喻式地使用这个意义,“转码”有时也使用在文艺学中,从一个体裁的文本转入另一个体裁,例如从小说“转码”为电影,有时候也说音乐家读乐谱时转码为内心声音。

而本文目的在于把“错位”“畸变”“转码”这三个概念应用到文化研究中。这与前面说的各种用法相比,抽象得多,意义也宽泛得多。既然是使用了三个其他学科比较随意使用的旧术语,本文就必须加以重新定义,免得与日常的用法混淆。

本文说的“错位”,指的是文本(或文本的某个成分),无法用文化中对该类型的文本已有的符码来做完整解释,此文化所承认的元语言,已经对此文本不

(完全)适用。例如废科举以后的八股文,无人欣赏其好处,在文化中产生错位,再例如一位女子行事、处世方式像男人,在承认她生理上是女人的同时,文化不得不承认她有男子(无论是好是坏)的品格,这就是文本与解释符码的错位。前面说过,错位一般被视为是一种错误,是文化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因此“女汉子”需要被孤立、被边缘化;万一此种解释符码冲突,在文化中沉积了下来,成为积极传统,有了“巾帼英雄”“女中豪杰”的元语言解释,那就出现了概念元语言的“转码”。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每时每刻在我们的文化中发生。可以拿同性恋、游戏沉迷、先锋艺术,网络弹幕,或墙头涂鸦为例,我们很容易看出“错位”的困惑,以及或许可能出现的“转码”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 2. 基因与模因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与技术,界限实在是并不分明,许多范畴与概念是相通的。与文化理论中的这三个概念最切近的,可能是生命科学中的基因理论。遗传基因的稳定性保证了一个生物物种的有效持续繁殖,生物体的种族特性一代代稳定地传下去。一旦基因的碱基发生错位(translocation),即是细胞分裂复制发生错误,或受化学品、辐射、病毒等影响,造成遗传变异,重复,插入等碱基位移或消失,此时如果错位有可能引发畸变(mutation)而畸变的生物体一般会夭亡,或无法繁殖而一代而终。但是相当少的情况下,可产生移码(frameshift),错位的基因由于某种机制而专递给后代,这就为新物种的进化,或是新品种的培育,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以上说的是生物的基因错位现象,其基本理念,与本文讨论的文化现象非常相似,为对应的文化理论提供了模式:文化中的符号与其意义解释方式(符码)的稳定延续,能保证文化表意方式(编码)与解释方式(解码)得以延续,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只是文化符号学中,这个关键性的储存并延续文化代代复制的元素,称为“模因”(meme),这是文化符号学模仿“基因”(gene)而创造的词。提出者生物学家道金指出,

“这是希腊语 mimema(模仿)的缩短,又让人可以想起英文‘记忆’(memory),法文‘相同’(meme)”。但是其基本意义是携带了各种意义能够在文化的人群中传播的“单元”,它可以是思想、行为、风格。

那么我们自然要问,这与文化中的其他符号有什么不同呢?模因是附有将文化传播开来,延续下去的重大任务的符号。基因要求其他分子严格地复制其碱基链的组成,而模因要求一个文化中后起的表意行为,尽快严格地模仿延续其文本方式,从而保持意义的稳定性。例如一个文化中的婚葬习俗、善恶价值。尤其是模因经常形成组合(所谓 memeplexes),即理论、系统、学说,也即是维持传统的文化元语言集合。模因组合中的单元不再单独起作用,而是形成一个体系。

社会文化极为复杂,上面描述了生物基因复制错位,在文化中更可能发生模因的模仿错位,由此产生不合文化规矩传统违反习俗的“怪人奇事”,在社会生活中或许更经常地发生。有的错位是个人生理或心理天生异形,并非有意地表现出来的(例如性格乖戾);有的错位是某些人作为意向性主体有意“作怪”创造的(例如《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魏晋文人怪癖);更有一些模因错位并没有真正发生,而是人用某些媒介化的表意形式(例如思想或文字,例如艺术活设计)“奇思异想”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文化生活中的“标出项”(the marked),也就是非正常项。

文化中,不管是自然出现的、被动的错位(例如发明一种新的食物吃法),还是想象筹划出来的、主动创造的错位(例如 Levi 公司有意把牛仔裤变成流行风格),开始时都会被该文化的大多数人认为是“畸变”,应当抛弃“此风不可长”,也就是不能成为一种延续下去的新的模因。最后也可能落到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最后被边缘化,被淘汰,从文化延续中消失,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成为记载中的无人再会模仿的轶事;另一种比较少的幸运者,被认为是“新生事物”进入文化的延续,被文化所认可,被许多后来者模仿,最后成为一种新的模因,吸纳进入文化主流。这时候在文化中就出现“转码”,也就是成为新的规范,变成新的评价准则或审美标准。

这两种结局(被淘汰或被吸纳)都对文化的发展造成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很不一样,文化秩序的延续与维持,靠的是把这些模因错位擦抹消除掉,扔进历史的“畸变”垃圾箱,而文化的演变革新,则是被承认的错位引发文化“转码”,重要的模因更新,甚至会引发历史巨变。

与生物的基因错位有可能造成生物进化一样,文化演变最重要的初始因也是错位。两个错位都发生在

有机体中,它们本质上都是意义的载体(基因链中的碱基、文化构造中的符号)发生变异,造成所在系统已有规则的解释困难,形成影响机体全局的复制异常障碍。错位发生的原因,在生物体中被动的居多,在文化中由于人的主体性,主动地居多。错位发生时,对于机体当时当刻的健康与稳定延续,都是不可取的:任何错位都是一种违例的风险。作为“畸变”丢弃处理,保守的方式总是比较稳妥的,但是也就丧失了改变的机会。最后结果是否为成功的转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清,这在生物进化中是自动清理,在人的文化中,决策往往参杂了许多主观价值判断。

文化的错位比生物的被动基因错位更加复杂的地方,是人的意义世界并不局限于实践意义活动,心灵意识的活动中的错位随时可以发生,思想与想象主观采取某种新的想法,本来就非常任意,但是由于意识对实践的筹划作用,随时可以转化为意义实践的指导。各种想象的创新经常超越主观意识,某些情况下,幻想甚至比“筹划”更能介入实践。有的谋士认为主公的梦境,有指导战略的重大意义;有许多理论家认为文学艺术不只是比喻地借用经验材料来虚构创作,而是比经验更高一层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内在整体性”,历史上《创业史》或《金光大道》等著作果然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

但是应当看到,意识错位并不是错位的实践,照理没有对文化的正常延续造成即刻的威胁,但是其后果可能比实践错位更重大,因为人的精神意义世界对实践的影响是元语言性的,即规范性的,而意识错位可以直接表述为元语言(例如一个新的艺术流派,可以用作品推出,但是更有效的方式是加上“宣言”),因此选择和改变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历代儒生不遵守孔子伦理的人多矣,只有王阳明和李贽敢于说出“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见言论比实践重要得多。哲学中创新的思想(例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学艺术的新的灵感或新的形式(例如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对任何文化活动的新的态度(例如五四的传统批判精神),都是意识的错位开始的。

心灵的错位创新,虽然比实践错位来得容易,却有可能产生改变历史的重大后果。例如美国南方黑奴的逃亡,“自由列车”偷运到北方几万黑奴,这是违反蓄奴制的实践错位,延续下去,借以时日,肯定会对文化现状的延续造成威胁。但是反蓄奴主义意识的出现,反蓄奴主义思想产品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却更直接地挑战意识形态元语言。以至于林肯说:“一个妇人写了一个小册子,结果引发了一场战争。”因此,意识的错位,或许更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后

果,引向影响深远的文化转码。思想影响比实践(例如胡适实践自己“白话诗”主张的《实验集》)影响重大得多,因为它们提出无法归入传统元语言的全新“模因综合体”,产生了社会文化的重大转码。

### 3.转码

转码这个关键词,使用于许多领域,在当今的人类文化中,可以说是一个常用的词,也正如所有的常用词,意义相当模糊甚至混乱。在应用于文化之前,这个词应用的学科之多,超乎想象,语义也经过了相当多的变化,为文化研究中应用此概念造成一定的困惑。

转码(transcoding)原意是“跨越解码”。解码原先的意义是:用既定符码解释某个符号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元素在这个系统中的“区别性特征”,即系统中其他组成元素之间互相依存又互相区别的关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黄灯在交通灯系列中的意义,既区别于红灯和绿灯,却又依赖于红灯和绿灯,单元既区别又依赖于系统。这时候,如果两个系统发生交叉,例如交通灯难以处理复杂局面时,交警出场,以手势辅助指挥,这时就必须有灯光系统与手势系统互相补充互相转换的关系,此时交警(跨系统编码者)与驾驶人(跨系统解码者),都必须统筹两个系统的意义,因为两个系统不一定完全一致,绿灯亮时,交警因为他判断的原因,不一定允许你前行。这时一个“转码”的最简单模型就出现了。

在语言体系这个人类最庞大的符号体系中,转码时时刻刻在出现。我们平时使用语言很难死守一个系统,转换不得不经常出现,让我们在不同场合可以使用不同语汇。例如在家对孩子说的语汇,不能用于办公室;朋友闲聊的话语,不能用于作报告;有的家庭里孩子对母亲与对父亲说话都会不同,开会或上课说普通话,与闺蜜悄悄话用方言。这种情况可以称为“换码”(code-switching)。这些都是符号系统的转换,只要系统不发生交叉,就不会出现转码的必要。最简单的翻译,看起来只需要换码。

系统交叉并且互相渗透,发生在广义的“翻译”中,也就是在应用一个语汇系统时,受到另一个系统的影响,不得不使用另一个语汇系统的某些要素。例如某人在说普通话作报告时,某个句子突然用了观众熟悉的家乡方言,某个词突然用了网络流行语,外交官某个词突然用了受访国的语言。如果属于口误,发生的只是“错位”。这时听者不得不依靠两套不同的意义提供的符码,来解答这个语汇的意义。如果说话者正是为了取得特殊效果,他期盼听者在这两套语汇系统中进行转换,使用一个“外系统词”,达到了某种目

的,取得了某种特殊意义效果,例如为了幽默,或为了亲近,例如“不忘家乡父老”,例如“懂得当代青年”,例如“尊重祖国人民”,这时就出现语言“转码”。

例如我们看电影,无论是3D、彩色或黑白,一旦沉醉于故事,各自的符号系统都能在框架内完成表意功能,都不会觉得异样。黑白片也能让观众陶醉,而不会一直记得是在看旧技术的电影。但是,一旦两种系统互涉,彩色电影中出现了黑白镜头,就出现了系统的“错位”。而当我们看出,这是用“主观镜头”再现主人公四五十年代童年岁月的回忆,系统中的另系统风格元素就携带了特殊的意义,而这意义需要跨系统的文化转码方式才能理解。

英国广播公司2015年11月22日报道称,两个美国白人青年冯·拉姆和戴维·罗西,决定开上海第一家西式中餐馆Fortune Cookie,原料卡夫菲力奶油芝士、四季宝花生酱、脆玉米片、英式芥末粉,甚至连酱油都是香港的。这些调味品在全球的中餐厅都有供应,从马德里到墨尔本,但是在中国大陆却没有这种味道。冯·拉姆说:“如果是一个老外,那99%的可能性你对本店菜肴很满意,如果你是当地的一个年轻中国人,70%的几率你可能会觉得满意。”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如果这个餐馆开在美国,就不出现这样的“西式中餐”系统与“中国正宗中餐”系统的互相干涉,餐馆老板现在寄希望于上海的年轻人中的70%进行这种饮食文化转码。

翻译本来是一种语言学行为,在一定情况下,会变成文化行为。很多翻译学者认为翻译时不能满足于“语言学换码”,而应当取得“文化转移”(transfer),后者是“转码”的另一种说法。很多文化论者坚持认为:翻译如果被狭义地理解为一个语言学问题,则会译而不得其神。斯皮伐克在讨论翻译时,说“转码”式翻译,是对“翻译产业”(translation business,意思是平庸的无创造力的翻译)的一种文化暴力行动。这个意义上的转码,也发生在体裁转换上,例如戏剧改编小说时,不得不把某些只有小说才能处理的元素(例如时空的自由转换,间接引语,人物视角等)转换成电影才能做得好的方式<sup>①</sup>。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某些翻译,看某些电影改变,觉得“太板”。

近年来,“转码”成了高频词,这是因为一个新媒体——视觉媒体与电子媒体——在人类文化中勃兴,而这领域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任何符码系统都无法稳定应用,不断被更新。例如录像带上的视像材料是“模拟式”的,不久就必须转码到CD光盘的“数字式”。系统的互相重叠交叉变换成了这个领域的不得不每天处理的工作,有的网站甚至设置了供大众使用的“转

码软件”例如《暴风影院》提供的视频转码器。

哪怕技术转换,也不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变化。例如电视的兴起,引发了关于报刊新闻与视觉新闻之间的转码。印刷新闻到电视报道,不只是一个后台支持,电视大量采用“第一人称讲述”大规模提高了新闻传播的主体间性<sup>12</sup>,例如大量的历史档案,现在可以电子化保存,引出了电影史资料、人类学资料等的“数字转码”。电影电视成为人类文化生活最主要的部分,直接引出了“电影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这个文化转码问题<sup>13</sup>。而任天堂(2005)和iPhone(2007)年推出的触摸界面,导致手持终端技术全面占上风,结果是“刷屏文化”在全球普及<sup>14</sup>。“文化的电子化”本身可能是人类历史最重大的转码之一。电子化的“五大原则”(“数字再现”、“模式性”、“自动化”、“变异性”、“转码”)转码成押底的结果性原则<sup>15</sup>。电子时代技术转码的急剧性,不只是当前文化转码迫切性的比喻,而且是其原因。

#### 4. 转码理论

最早提出“文化转码”这个概念的,是著名的符号学家、塔尔图学派领袖洛特曼。1965 他发表著名的论文《论次生模塑体系中的表意问题》,第一次提出转码概念。所谓次生模塑体系,就是非语言符号体系<sup>16</sup>。各种符号体系的并存就会互涉。它们对我们的意义世界起模塑作用的方式不同,就必然出现语言与其他符号体系的转码,或各符号体系之间的转码。

此后讨论“转码”的思想家中,有德勒兹和加达里,他们在名著《千高原》中讨论到“转码”的必要性:每种表意形式,构成一种独特的“环境”(milieu)也就是这种表意方式独特的“编码秩序区”,每一个“环境”是一个编了码的时空区,编码的使用重复保证秩序。因此,当这种“环境”互相叠合,就使表意形式不得不处于“永恒的转码状态”之中(in a state of perpetual transcoding)<sup>17</sup>。

推进文化“转码”概念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他指出从现代到后现代,是一个社会文化总体性的转码过程<sup>18</sup>。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哈尔彭在讨论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指出,在近代历史上,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一般称为社会阶段的“过渡”(transition),实际上是一种意义方式的大转变,应当称为社会形态的“转码”<sup>19</sup>。这不是简单地改变术语,实际上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社会剧变不完全是生产方式的演变,更重要的是意义方式的更新。

应当说,“转码”并不是一个方便的概念,在 20 世纪的术语环境中,“转码”的纯技术特征一直没有消除。除了在个别场合,例如语言学、媒介理论、符号学

等,“转码”所指的符码的转用,比较贴切。相当多的论者情愿换用“形态变化”(transformation)、“另文化化”(transculturation)、“另创造”(transcreation)、“跨变”(transversality)等等<sup>20</sup>。无怪乎某些文化思想家,例如本雅明,例如德曼,坚持用“过渡”(transition)一词,而不用听起来逻辑味太浓的“转码”<sup>21</sup>。术语的过于散乱使讨论无法集中,使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得不到明确的推进。

与所有其他类似的概念相比,“转码”恰恰是意义理论最合适使用的术语,因为元语言是符码的集合,如果我们同意“文化是一个社会表意活动的总集合”,那么意识形态就应当是“文化的元语言”。“转码”直接点出了核心问题:厘清这个概念,要求我们对符码和元语言做更深入的研究。

首先,错位的发生,有可能是体系内部本来存在的异元素引发的,畸形后代的产生,往往是基因中的隐性缺陷变成显性的结果。但是更可能的原因,是两种体系的互相干涉。最为人所知的例子,是马和驴子的后代骡子,狮子和老虎杂交的后代“狮虎兽”。不同物种相互干涉,必须基因非常类似,即使如此,后代也是“畸变”产物,没有生育能力。每一个物种的基因都有保持不被侵犯、不被改变的功能,这是“基因稳定”。文化上的配合,却是一种主观可控过程:文化有保持纯洁的本能,因为一个文化的元语言(即意识形态),拒绝或无能力解释或欣赏某些异文化的元素,不得不给予排斥。但是一个完全排外的文化又是一个僵化的文化,因为文化之间的异系统碰撞与互渗随时随地在进行。

在这问题上,洛特曼(Juri Lotman)的符号域(semiosphere)比较清晰地说明了系统变异的必要性。洛特曼受到化学家维尔纳茨基“生物圈”(biosphere)概念的启发,将符号域视为人类文化模式得以实现的“连续体”。符号域是有边界的,其中的各个符号系统既具有独立性,又在共时关系上彼此交换;同时,符号系统自身具有记忆功能,并在历史纵向上相互影响。上述三种符号运动在不同组织层面上进行,实现信息的传递、保存、加工和创新。换言之,符号域就是一个模因集团起作用的范围,也就是一个文化社群。

符号域的基本特征是不匀质、不对称,因此充满了内部的变异动力。符号域在结构上是多层级的,中心是最有序、最稳固的符号系统,结构上自我满足,自我规范,但灵活性较低。边缘则松散无序,是各种“部分错位”的亚文化存在的区域,充满不确定性,秩序有点混乱,但是具有发展潜力。一个文化中的符号的性质、可译度、发展速度和循环量值有所差别,在彼此碰

撞中驱动着符号空间结构的动态发展。<sup>②</sup>

更重要的是符号域之间的互相交流。正如基因容易受到异物(化学品、辐射、异物种入侵、气候或环境变化)的影响而发生错位变异,而文化的边界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干涉,生物体的排斥异体的反应强烈得多,文化虽然对“非我族类”有排斥,毕竟不同文化都是人类的文化,全面接受异文化不太可能会失去自我,但接受部分异文化的模因,不得不经常发生。此时发生的“错位”(例如异国服装)在异文化中本是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不容易被当做畸变而淘汰,很容易被接受从而引发转码(例如胡服骑射)。注意这里交换的是模因,即对符号的解释和评价,奇装异服如果只是用来炫奇(例如在化装舞会上),依然是“畸变”,不形成转码。而新的模因是价值观的变化,是对奇装异服的评价和赞赏。符号域的边界是文化内外两个空间的结合部,是不同文化互相干扰的区域。它是符号语言转换的机制,有可能将异文化模因转换为本符号域的内部模因。

由此产生符号域系统的熵(entropy)概念。从无序到有序两种结构的互相干涉,使符号域永远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物理学家伊·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在区分系统的平衡度时提出的物理学概念,系统宏观上的稳定结构,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能获得,系统也因此永远处于由无序转为有序的状态中。而一旦过于有序,即“熵”过低,符号域就坠入僵化。“熵”在符号域各个部分中的不平衡分布体现了无序和有序两种结构的互相侵入,强调了文化动态发展的特征。

符号域的内部结构必须依靠与外界的文本交流才能自身维持发展,在有序部分(熵值较低的符号域中心部分)和无序部分(熵值较高的符号域边缘部分)相互冲突中,整个文化系统的动态平衡得以保持。这意味着文化的渐进发展和爆发是交替进行的。总的来说,文化有自我稳定机制,也必须有允许紊乱的机制;二者的相互作用使文化不仅可以正常运转,也能使它不断活力更新,这就是为什么“转码”是一个文化不得不随时进行的工作,如果它想要延续、更新、发展。

### 5.后现代转码

把“转码”这个术语做了意义最惊人的使用的,是激进女权主义者、美国著名的跨学科文化学者唐娜·哈拉维。哈拉维的《赛博人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在1985年发表时,的确惊世骇俗,有些人觉得是故意耸动视听,有的人认为机械味太浓。但是近三十年时代的巨变,证明了她的论述有先见之明。所谓“赛博人”(cyborg)是控制论

(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两术语的合词,哈拉维对“赛博人”的定义是:“一个受控制的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我们已步入了一个‘人机合体’的时代。”“赛博人”不止是指体内装有电子设备的人,还具有更深的文化内涵——它是“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有些中译者译为“机械人”“生化人”“受控制生物”等等。所谓“控制论”就是利用科技来增强人的身体性能,由于电子技术在这方面的突飞猛进,“赛博人”似乎可以被定义为“电子装置一定程度地控制生理过程的人”,或者简称为“人机合体”。

进一步说,“赛博人”叠合了人和动物的界限、人和机器的界限、自然与非自然的界限,甚至迫使人类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灵魂究竟是否能变异。哈拉维举转基因番茄为例,“赛博人”已脱离了原来的种群,有交叉的元语言方式、身份延续的断裂,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在这世界上的定位。

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种“人机合体”,就是获得了足够仿生能力的人工智能(AI)的电脑机器,可能其身体不是“有机体”,但是它们却有人的智力特权(例如学习,例如情绪),它们是从另一个方向靠拢“赛博人”的转码体。

人机合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对于这种全新的主体,其个体受到群体、社会等传统规范的制约或许会很不相同,或许他们无须带上旧有的精神镣铐。哈拉维借由“赛博人”理论,对西方传统思想的二元格局提出质疑,认为二元总是一方处于优势的非标出“正常”地位,另一方则成为弱勢的“标出项”。而在人机合体的“赛博人”主体中,没有一方处于标出地位,因为有机体在本质上合一,无法割舍或忽视任何组成部分。

因此,哈拉维做出了至今听来都非常惊人的人类历史的转码前景:“这个时代使原本恒定的一切界限被逾越,一切似乎颠扑不破的分类原则被打破。”<sup>③</sup>甚至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转码,成为一种新的物种:“在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嵌合体(Chimera),是拼凑而成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血儿,简而言之,我们是赛博人。赛博人是我们自己。”<sup>④</sup>如此信心十足地宣告一个人变成一个全新物种,人类历史的全新时代来临,的确需要气派。连哈拉维本人都声称,现代人类文明特有的虚构表意形式“现实主义小说”将要被科幻取代。克鲁评论哈拉维的文章,标题干脆称为“转码这个世界”(Transcoding

the World)。

哈拉维说的这个“新物种”,在80年代中期已经不是科幻小说中的人物,而到今天,人机合体的技术已经越来越普遍,从脑控假肢,到心脏起搏器已经相当常见,而转基因植物与克隆动物,则在争议中发展。这样的人机合体,是人类的生理—心理(肉体与精神)体系,与电子技术体系的交叉叠合,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组合,而是双方处理符号意义的方式的全面嵌合,两套意义体系的冲撞和融合。因此,现在看来,或许应当被称为“电子转码人”。

在19世纪的早期科幻小说中,人机合体(或用化学药物改变身心)都遇到悲惨的结局,命中注定是“畸变人”怪物。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 Mr Hyde),都认为机器或科技最终将毁灭人的灵魂,看来电子时代到来之前,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样的人机合体或人科合体,是灵魂与技术的错位交叉,双方不安其位,人性丧失,或缺少人类文明的最基本适应力,只能作为畸变被淘汰。

一个多世纪之后,在电子时代的黎明时,哈拉维却认为人机合体造成的人的本质转码,会让整个人类文化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位“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显然嗅到了变革之风,看到了人类本身即将面临的大转码。■

#### 【注释】

对应的英文词可以是 mismatching, displacement, transplacement, translocation, 等等。

赵彦春《归化异化的学理思辨》,载《英语研究》2012年第2期。

陈声钢《音乐活动中的内心听觉》,载《中国音乐家》2006年第1期。

胡易容《人文学科的科学化》,载《符号与传媒》2015年第11辑。

Richard Dawkin,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92.

<http://news.163.com/15/1128/00/B9FG60DL00014A-EE.html> 2015年11月28日查阅。

Mary Snell-Hornby, “Linguistic Transcoding and Cultural Transfer: 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1999, London: Pinter, p.87.

Kenneth Au, “Cultural Transfer in Advertisement Translation”, *Babel*, Vol. 45, No. 2, 1999, pp.97-106.

Douglas Kellner, “Cultural Studies and Philosophy: An Intervention”, in (ed) Toby Miller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 2000, p.140.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lation as Culture”, in (eds) Paul St-Pierre & P. C. Kar *In Translation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Transformations*, London: John Benjamin, 2007, p. 97.

⑪ M. de Marinis, *The Semiotics of Performa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4.

⑫ Susan Jakobson, “Transcoding the News: An Investigation into Multimedia Journalism published in nytimes.com”, *New Media & Society*, 2012, Issue 2, p.98.

⑬ Douglas Kellner, *Medi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57.

⑭ Stefan Werning, “Swipe to Unlock: How Materiality of the Touch Screen Frames Use and Corresponding Perception of Media Content”, *Digital Culture & Society*, Vol. I, Issue 1, 2015, pp.55-72.

⑮ 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p.84.

⑯ Yuri Lotman, “On the problem of signification in secondary modeling systems”, *Papers on Sign Systems*, vol. I, Tartu, 1965, pp.22-37.

⑰ Gille Deleuze &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384.

⑱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93.

⑲ Richard Halpern, *The Politic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English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the Genesis of Capital*,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92, p.

⑳ Eva C. Karpinski et al., *Trans/acting Culture: Writing & Meaning*, Waterloo, Ontario: Wilfred Laurier Univ. Press, 2013.

㉑ Jonathan Crewe, “Transcoding the World: Haraway’s Postmodernism”, *Signs*, Vol. 22, No. 4, Summer 1997, p.893.

㉒ 彭佳《对话主文本体:皮尔斯和洛特曼符号学视域中的文化标出性理论》,载《符号与传媒》2015年第11辑。

㉓ 金惠敏《消费·赛博客·解域化——自然与文化问题的新语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9期。

㉔ Donna Haraway,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Issue 80, pp. 107.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中期成果之一,项目号:13&ZD123)